

為一種澳門的全球性教育努力

杜愛寧*

“澳門地方，華夷雜處。”

18世紀—奏疏¹

澳門為多元文化地區？

1997年，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楊秀玲老師在談到澳門的語言教學時，寫道：“文化交流的深度和質素，取決於其載體和傳送帶的語言。而語言的準確、熟練和表達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語言教學的質素和效果。然而，綜觀今天的語文教學，尤其是外語教學，其整個過程無論從教學目標、內容、方法到評估，都很少考慮到文化因素和文化交流的目標。”²

可以看到的是，15年後，現實的情況未發生重大變化。雖在中國中央政府的倡議下，於2003年設立了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

“‘論壇’的性質，是由官方舉辦，以經濟合作及發展為主題的非政治性國際經貿合作論壇。其宗旨在於加強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與合作，發揮澳門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作用，促進中國、葡語系國家和澳門的共同發展”。³當時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將澳門比作與葡語國家對話的“平台”，但這些原則未反映或體現到澳門的教育體制中。

的確，“對話”一詞意味著需要理解和尊重語言，而文化是通過它們表達的。多語制可以促進這一對話，減少社區自閉的危險，幫助

*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高級技術顧問。

1. 安文哲、何思靈：《澳門文化史》，里斯本，歐維士基金會及調查出版社，第2版，2009年。
2. 《澳門公共行政雜誌》，1997年，第10卷，第4期（總第38期），第1199—1204頁。
3. <http://www.forumchinaplp.org.mo/pt/aboutus.php>, 2012年12月訪問。

建立一個較少受到衝突傷害的社會和適應急劇變化的現代世界⁴，其諸多益處是不爭的，並得到了眾人的承認。

澳門所具有的歷史和文化條件可使得在此——這裡的流動人口一直是一個重要的人口構成份——共存的各個社團之間的不同構成一種潛在的優勢，促進了構成這個社會的多樣文化之間的和諧關係。

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移入人口是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2011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在澳門以外地方出生的有326,376人，佔總人口59.1%，較十年前上升3.0個百分點。按出生地劃分，在中國大陸出生的有255,186人，佔總人口46.2%，較十年前減少1.2個百分點。澳門出生的有226,127人（佔0.9%）、香港有19,355人（佔3.5%）、葡萄牙有1,835人（佔0.3%）。外地僱員增加，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出生的人口明顯上升；其中，在菲律賓出生的有14,544人、越南有7,199人、印尼有6,269人，合佔總人口5.1%。另外，在葡萄牙以外的歐洲地方出生的有1,942人、美洲有2,252人、非洲有959人，在大洋洲出生的亦有672人。”⁵

“在澳門，使用廣州話為日常用語的有449,274人，佔年齡在3歲及以上人口83.3%，較十年前下降4.6個百分點。由於移入人口及外地僱員增加，使用普通話（5.0%）及英語（2.3%）為日常用語的較2001年前明顯上升3.4及1.6個百分點。整體語言能力方面，有41.4%能講普通話，較2001年增加14.7個百分點；另外，有21.1%能講英語、有2.4%能講葡萄牙語。”⁶

然而，在理解和整合澳門所具有的巨大的種族、文化和語言的現實，促進多元文化及全球化意識方面，澳門的教育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從它形成之初，一直是一個多種族的地區，葡萄牙語從來是澳門的官方語言（這一地位是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⁷，及而後的

4. 《教科文組織世界報告：著力文化多樣性與文化間對話》。

5.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1年人口普查詳細結果）。

6. 同上。

7. 參閱<http://www.gddc.pt/siii/docs/rar25-1987.pdf>

1993年“基本法”第一章，第九條⁸所確定的），但從未反映到教育體制當中。

目前澳門的葡萄牙語教學狀況

儘管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6世紀，葡萄牙語的教學和傳播很遲才成為了以前的葡萄牙政府關注的重點，尤其是成立了葡中學校。這個計劃略有成效，但最後的結果還是逐漸消亡。

目前，葡萄牙語課程僅在官方的葡中學校葡語部是必修的，在教育暨青年局網的私人學校內⁹，是選修的。具體課時如下：

小學教育	中學教育 ¹⁰	中學教育
每週2個課時， 每次40～60分鐘	每週3～4個課時， 每次40～60分鐘	每週2個課時， 每次40～60分鐘
(每學年260～330課時)	(每學年440～600課時)	(每學年260～330課時)*

* 每年課時數的變化根據學校對課時時間的選擇。

學校有關課程組織的自主權，所以它們可以選擇將兩個課時合二為一和課時的長短。最通行的是，同一天安排兩個週次，每次40分鐘。

除了課時負荷的分佈外，請參考以下與澳門的葡萄牙語作為外語教學的約束：

- 缺乏具有教授葡萄牙語作為外語培訓的專業教師；
- 使用於母語教學相同的方法；
- 缺乏適用於漢語為母語的中國學生的教材；
- 英語的迅速擴張（更多需求，較之葡萄牙語，學校需要增加一倍以上的英語，見有關圖表）。

8.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載<http://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asp>

9. 在此背景下，澳門的葡文學校不在此例，因為它的體制與葡萄牙體制並行。葡萄牙語是一門學分課程（作為母語授課）。

10. 此種課程量安排實屬罕見。

學校統計圖表（2011/2012學年）
學校單位數（以教育程度和使用語言劃分）

使用語言	學前教育	小學教育	中學教育	學前教育+ 小學教育	學前教育+ 中學教育	學前教育+ 小學教育+ 中學教育	特殊教育	總計
漢語	10	8	25	31	-	10	4	100
英語	1	1	2	-	-	5	-	13
葡萄牙語	1	-	3	1	-	1	-	6
總計	12	9	30	32	-	16	4	119

統計日期：2011年11月26日¹¹

學生與葡萄牙語零星和無語境接觸的後果（每週一節課，缺乏校外練習的機會），加上上述的約束，為下述情況的出現匯集了一條件¹²：

- 因為遇到的種種困難，學生的放棄；
- 由於教學過程的業績不佳，教師缺乏動力；
- 因此，對特殊群體的專門教育計劃的發展不佳，其結果是在土生葡人社區內，葡萄牙語逐漸消失；
- 學習者不需要以葡萄牙語來進行日常溝通。

然而，出乎上述描寫的情況意料的是，葡萄牙語在目前的情況下，有了改觀。在過去的十年中，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人已表示有興趣學習葡萄牙語。造成此種需求的主要原因是與經濟利益及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大量貿易有關。¹³

11. 教育統計載http://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category/teachorg/Inter_main_page.jsp?id=8525

12. GROSSO, M. J. dos Reis:《談向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士教授葡萄牙語的方法論》，澳門，澳門大學，2007年。

13. ESPADINHA, M. A. & TEIXEIRA e SILVA, R. : “澳門的葡萄牙語”，載瑪麗亞.塞利亞.利馬-埃爾南德斯、瑪麗亞·若昂·馬爾薩羅、萊蒂.瓜拉西亞巴及維瑪.莉亞.德.羅西.馬丁合編：《葡萄牙語言在世界上》，聖保羅，聖保羅大學哲學、文學及人文科學學院，2008年。

然而，中國學習葡萄牙語需求的大繁榮產生於2005年。當年中國的經濟增長超過了20%，需要聘請語言翻譯，來與巴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有前途的市場對話。反復提到澳門是一個基本因素，一種平台，甚至中國中央政府亦如是認為。¹⁴

何種未來？

據GROS（2003年）¹⁵和來自他的數據表明，“全球化，在經濟和技術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遠遠領先於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全球化”；那麼這意味著，教育應該根據新的參數和範式，進行新的反思。這為學校提出了許多挑戰，特別是要鼓勵發展橫向和多學科的視角，要成為文化、知識和全球共存的民主空間。

雖然在澳門認識到了葡萄牙語教育和掌握葡萄牙語及學習土生葡人文化的重要性，在學校課程和學生技能方面有所安排，但澳門106所學校中有93所私校這一事實妨礙實施變革。

學校，除了是一種社會機構外，更是一種本地實體，傳輸當地的價值觀。是用當地或國家的稅收維持運作的，因此要服務於當地或國家的目標，為地方經濟培養的勞動者。¹⁶然而，由於全球性的競爭，往往乞靈於國際的比較研究來開展教育改革和採取衡量課程的標準；2009年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結果顯示，澳門佔據世界各地平等接受教育的首位。亦顯示，同樣是這些學生均低於經合組織在文化素質水平方面的規定，尤其是涉及到批評分析和解釋的能力。例如在加德納¹⁷看來，這是全球社會所需要的基本功能。

14. ROCHA, Rui: “葡萄牙語——澳門及中國的‘珍品’”，向“普拉亞國際學術討論會：國外僑團的葡萄牙語”提交的論文，普拉亞，葡萄牙語國際學院，2011年11月。

15. GROS, François: “知識社會對大學的挑戰”，載《全球化、科學、文化與宗教》，里斯本，高秉根基金會及堂吉訶德出版社，2003年。

16. ZHAO, Y.: 《趕上或一路領先：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教育》，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監督及課程發展協會，2009年。

17. Gardner, Howard.: “如何教育改革：歷史、科學及價值的考量”，載馬塞洛·M·蘇亞雷斯·奧羅斯科及德西瑞·鮑簾·勤希利亞德主編：《全球化·新千年的文化與教育》，倫敦，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53-255頁。

澳門的教育體制及其政策企圖尋求應對這些挑戰，使得學校要重新評估課程和教學法，讓學生掌握技能和知識，以能夠克服目前的狀況。學校需要建立面向全球的課程，為獲得“全球競爭力”而努力，例如推動外語授課提供這方面的投資、流利使用外語、編寫適當的教材和深刻地理解其他文化；需要確定可以做些甚麼來幫助年輕人與來自不同的文化和國家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和交流，原因是他們所面臨的跨文化溝通的強度和頻率日益增加；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學校也需要為教師提供合適的訓練，讓他們理解全球化的影響，讓他們有不同文化和語言的能力。

總之，澳門的教育所面臨的挑戰與其他許多地方所面臨的挑戰無很大的不同，在思維方式和發展一個世界公民意識方面，要具備一種全球性的眼光。

目前，跨文化教育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語言習得過程不可缺少的，同時，它又被認為是通識教育的一個有用的工具”。¹⁸教育計劃中頻頻出現諸如“文化能力、社會文化，跨文化、跨文化主義和多元文化之類的詞語。”這些都伴有概念化或定義，而且“近幾年提出的跨文化交際模式的本身，不是很具有相當充分的普遍性，因為它們是在西方的背景下發展的，因此具有潛在的種族中心主義（如同文章的標題）”。要質問的是，這是不是又是一種“烏托邦”？

18. SEQUEIRA, Rosa Maria: “跨文化交際為一種烏托邦？”，載彼得·彼得羅夫、彼得·德·索薩·金提諾、羅伯特·洛佩斯·伊格萊西亞斯·薩馬爾廷及埃利亞斯·托雷斯·飛亦若：《葡萄牙文學和文化的進展·二十世紀》，第3卷，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及法魯，國際葡萄牙學者協會及通過出版社，2012年，第303-316頁。